

李商隐

刘学锴 余恕诚



暨南
文庫

中国文学史知识读物

李



李
學
鐸

子武大

中 华 书 局

1980年·北京

中国文学史知识读物

李 商 隐

刘学锴 余恕诚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32·4⁵/₈ 印张·88千字

1980年1月第1版 1980年1月成都第1次印刷

印数：1—81,500册

统一书号：10018·436 定价：0.32元

目 录

第一章	李商隐生活的时代	1
第二章	李商隐的生活经历(上)	9
第三章	李商隐的生活经历(下)	28
第四章	李商隐与牛李党争	46
第五章	李商隐的政治诗	60
第六章	李商隐的咏怀诗和无题诗	83
第七章	李商隐诗歌的艺术特色	103
第八章	李商隐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124

第一章 李商隐生活的时代

李商隐是我国唐代后期一位有重要成就的杰出诗人。无论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还是在总结前代艺术经验加以开拓和创新方面，他都远远超出唐后期那些创作天地显得狭小或格调偏于绮靡的一般诗人之上，而卓然自成大家，给后世以深远的影响。他的诗具有较强的艺术力量和含蓄婉转、寄托遥深的特点，往往使人们既受到吸引，又感到难解，而某些弱点和局限，则可能产生消极作用，有必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对它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价。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唐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关于他的生年，研究家们有过多种推断。他在开成元年写的《上崔华州书》中曾说：“愚生二十五年矣。”清代冯浩和近人岑仲勉以此作为主要依据，推定其生于元和八年(813)，大体上是可信的。他活了四十六岁，卒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一生经历了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六朝。这时，曾经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繁荣强盛的唐王朝，已经衰落下来了。广大农村，一片凋敝景象，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急速发展，日趋激化。在统治阶级内部，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倾轧等现象也十分严重。由于危机重重，唐王朝窘困不堪，逐渐进入了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上层也不能照旧生活和

统治下去的境地。

标志着唐王朝总崩溃的开始，是席卷了各阶层的伟大政治风暴——黄巢起义，那是李商隐逝世十六年以后的事。李商隐生前所历的几朝，大体上可算在它的酝酿期之内。这时，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严重问题，是正在残酷进行的土地兼并。唐朝开国初年，曾实行过均田制，把隋末农民战争以后形成的大批无主地和荒地分给农民耕种，以便收取赋税，这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地主阶级经济和政治势力上升，他们超额霸占土地的活动也随之而起。通过各种形式的兼并，到了唐中期，大部分农民的土地都遭受掠夺，均田制便被地主阶级的庄园经济所代替。德宗建中元年颁布两税法，规定按田亩纳税，等于确认富豪占有大量土地完全合法。这样，整个地主阶级对于尚余若干小块土地的农民的掠夺，以及大地主集团对于中小地主的吞并，就更加肆无忌惮了。当时著名的政论家陆贽曾指出：“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坏，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豪，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罄输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贫富悬绝，乃至于斯。”（《陆宣公翰苑集》卷二十二）陆贽所讲的是均田制破坏，原均田户下降成为佃农的悲惨情景。到了李商隐的时代，情况更坏，有些人则连佃农也当不下去了，“海内穷困，处处流散”，穷民百姓大批破产逃亡。

造成农民纷纷破产的原因，除土地兼并外，再就是苛重的赋税。中晚唐时期，战乱频仍，军费开支大增，单是文宗大和年间讨伐李同捷的一场局部战争，就使李商隐发出了“中原日

调万黄金，几竭中原买斗心”的慨叹，其它规模比这还要大的战争，耗费更可以想见。由于战争的失利，致使河北地区陷入藩镇之手，陇右一带沦为吐蕃所有，又出现了李商隐所说的“国蹙赋更重，人稀役弥繁”的局面。加上统治集团的挥霍和官吏的贪污，使赋税的苛重和名目的繁多，达到了前代少有的程度。当时，多数州县户口和耕地尽管减少了，但税额并不减低，“有流亡则摊出，已重者愈重”。而有权势的富户，又往往隐匿田亩，进一步把重赋转移给贫户。如诗人元稹在同州做官时就曾指出：同州地区由于百姓逃移，河沙侵吞，耕地逐年减少，官府都是按原定的虚额征税，但豪富兼并，广占阡陌，十分土地，纳税不过二三，其余税额，全部压在贫户身上。《新唐书·食货志》还记载：晚唐时有的豪富侵吞产业，并不转户，原主已失去土地，仍须负担赋税。这样，农民在土地兼并和重赋的双重打击下，不仅愈来愈多地逃亡，并且进而聚集为一股股起义武装。“盗贼亭午起，问谁多穷民。”李商隐这里所写的是文宗朝末期长安郊畿的情景，其余地区和往后的状况，自然更甚于此。诗人死后第二年，爆发了浙东裘甫起义，正式揭开了唐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不过，农民的反抗，在李商隐生活的时期，毕竟还只象水层底下的伏流，多数时候表现得并不十分剧烈和显著，而激荡在那一段历史河流面上的风浪，则往往表现为统治阶级内部各种势力的斗争。李商隐出生后的第二年，国内发生的一件大事，就是淮西地区军阀吴元济违抗朝命，公开割据蔡州一带，引起朝廷兴兵进讨。这种藩镇割据，自安史之乱以来，已经为害了半个世纪。他们在所控制的地区搞独立王国，“以土

地传付子孙，不禀朝旨，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旧唐书·李宝臣传》）对朝廷以军事力量相威胁，对百姓则“暴赋暴刑”，进行极其残酷的剥削与压迫。吴元济统治下的蔡州，就是“随日赋敛于人”（《新唐书·吴少阳传》），“途无偶语，夜不燃烛。人或以酒食相过从者，以军法论”（《旧唐书·裴度传》）。这些军阀，是典型的害国蠹民的蠢贼。但吴元济由于拥有相当兵力，又得到成德镇王承宗、淄青镇李师道的支持，竟以数州的土地，与唐军对抗了四年之久。最后宰相裴度亲临前线督战，名将李愬雪夜奇袭蔡州，才一举擒获了吴元济。这场战争的胜利，在唐中期具有重要意义，使朝廷的威望，一度有所恢复。唐军乘胜讨平了李师道所盘踞的淄青镇，其余叛镇纷纷表示归顺，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元和中兴”局面。但当时政治上的许多积弊依然存在，军事上的一时胜利并不巩固。宪宗晚年特别宠信宦官、迷信神仙。宪宗以后的两个皇帝（穆宗、敬宗），更加荒淫昏聩，于是“中兴”的局面转眼即逝。穆宗朝，河北地区的幽州、成德、魏博三镇再度恢复割据。敬宗朝，横海镇（今河北沧县）节度使李全略死，子同捷据镇自立，腐朽的唐朝廷竟置之不问。直至文宗即位，进行了长达三年的战争，才勉强讨平。然而这场战争并没有扭转黄河中下游一带的形势，距横海镇不远的河北三镇，仍继续维持割据，直至唐朝灭亡。

文宗朝讨李同捷战争的胜利，未能象宪宗朝平蔡之役那样使朝廷的威望相应获得提高，与这时朝廷本身更加腐朽和混乱有关。从宪宗宠信宦官而终于被宦官谋杀开始，以后各朝皇帝的命运就经常掌握在宦官手里。他们控制了朝廷的军

政大权，凌驾于朝官之上，即使杀死当朝皇帝，再立一个新皇帝，百官也只能照例去祝贺，根本无人敢于抗争。穆宗以后的敬宗，年幼无知，即位仅两年多，就被宦官杀死，另立了唐文宗李昂。文宗不仅没有多大权力，就连生命也感到没有保障。这样，中央政权自然被人轻视，出现“威柄陵夷，藩臣跋扈”的局面。

由于社会现实危机的推动，大和二年，进步人物刘蕡在应贤良方正科考试的对策中，公开指责宦官“威慑朝廷”，使“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四海将乱”。要求文宗屏退宦官，把政权交给宰相，兵权交给将帅。他的对策，考官非常叹赏，只因畏惧宦官，未敢录取。但策论广为流传，引起强烈反响，满朝议论纷纷，替刘蕡抱屈。刘蕡虽然下第，却代表了朝官中的进步势力，对宦官发动了攻击。文宗看到朝官与宦官存在着尖锐矛盾，也打算依靠朝官，消灭宦官。可是他暗于用人，更不懂得宦官代表着一种社会势力，并非轻易可以剪除，因而接连两次都遭到失败。

文宗第一次倚用的是宰相宋申锡。宋申锡资望较浅，在朝官中力单势孤。他秘密搜罗助手，事情很快就被宦官发觉，诬以谋反的罪名，远贬到开州。宋申锡失败以后，文宗又提拔并倚用李训和郑注。李、郑两人不过是投机家，以为诛宦官有利可图，急于成事，但实际准备工作草率不周。大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李训上朝使人奏称左金吾卫大厅后石榴树上夜降甘露，企图诱宦官仇士良等去验看，加以诛灭。仇士良至时发觉有伏兵，逃回殿上，劫走文宗，派禁军大肆捕杀朝官。李训、郑注连同事先未参预密谋的宰相王涯等都被族诛。宦官

还纵兵在长安大肆行凶，把许多人家和街坊洗劫一空，造成“流血千门，僵尸万计”的惨祸，史称“甘露之变”。这次事变是唐后期皇帝、朝官与宦官较量的一次惨败。从此文宗处处更受挟制，“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宦官)，宰相行文书而已”。文宗在宦官的严密监视下，终日愁苦，自称受制于家奴，连周赧王和汉献帝两个亡国之君都不如。终于郁郁而死。李商隐曾在哀悼文宗的诗中说：“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的确，此时的唐王朝想要拔除宦官一类盘根错节的恶势力，挽救自身的危机，已经很难了。

与宦官专权于内，藩镇割据于外相伴，晚唐朝廷官僚集团之间的纷争也特别激烈。大和初年，在原派系斗争的基础上，形成所谓牛、李两党。牛党以李宗闵、牛僧孺为首，李党以李德裕、郑覃为首。在一系列问题上“是非锋起”，争闹不休，连文宗都慨叹说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两党的门户之见都极深，一党得势，便尽量擢用己方成员，斥逐另一方，形成势不两立的局面。这种斗争，在文宗朝表现为两党间忽升忽降，此进彼退的局面。而在此后的武、宣两朝，则一朝专用一党。朝政的好坏，也跟所任用的党魁有关。

武宗朝，李党首领李德裕很受唐武宗李瀍信任。李德裕是唐后期有才干的政治家，会昌二年，在他的谋划下，唐朝廷组织力量击溃了回鹘乌介可汗对北方地区的侵扰。会昌三年，昭义镇(辖地相当于今山西东南、河北西南部地区)节度使刘从谏死。其侄刘稹图谋割据，当时朝臣多主张姑息，李德裕力排众议，建议用兵讨伐。他认为昭义镇近处心腹，如果允许世袭，四方藩镇都会效尤，朝廷号令根本无法再推行。武宗采纳

了李德裕的主张和策略，于会昌四年平定了刘稹的叛乱。武宗和李德裕又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裁减冗官、打击佛教，并着手筹备恢复沦于吐蕃的河湟地区。由于在处理军政方面收到成效，朝廷威信有所提高，宦官力量相应退缩。会昌三年，唐武宗不让枢密使（宦官）预知，任命崔铉为相，宦官不敢公开出面抗争。同年，又迫使仇士良退休。第二年，仇士良死后，更追削其授赠官爵，没收其家财。

在唐后期腐朽势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李德裕等所取得的一些成就，实际上并不能根本改变唐王朝江河日下的总趋势。武宗晚年好神仙、宠女色，缺乏进取心。李德裕本人是李党首领，用人不免凭爱憎，日久积怨甚多。武宗死后，宦官拥立宣宗李忱，牛党的白敏中、令狐绹先后当权。各种腐朽势力共同排斥武宗朝的有功将相，否定会昌年间的政治措施，并将李德裕迫害致死。由于政局恶化，各项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宣宗朝，骄兵悍将的跋扈之风重新抬头，大中后期竟蔓延到了原来比较安靖的南方各州县。至于下层人民的反抗斗争更愈演愈烈，从川陕边境，到长江中下游，不断出现具有相当规模的农民起义。大中五年，蓬果二州人民以鸡山为根据地展开斗争；大中六年，湖南邓裴举行起义；大中十三年，浙东裘甫起义，“声震中原”，唐朝廷大为惊恐。史称：“唐亡，诸盗多生于大中之朝……贤臣斥死，庸儒在位，厚赋深刑，天下愁苦。”（《新唐书》卷二二五）说明宣宗时的政治，比以前几朝更黑暗，农民革命斗争已经在积聚和扩大力量，准备着正式走向历史前台，彻底摧毁唐王朝的腐朽统治。

“玉垒经纶远，金刀历数终。”李商隐所处的，就是唐王朝

在多种政治和经济因素制约下，趋于没落的时期。这时，统治阶级中某些才智之士，尽管仍然想要挽救唐王朝的颓败之势，但又势必不能有大的作为。李商隐一生坎坷不幸，襟抱未开，写下了许多情调抑郁、感时伤世的诗歌，与他所处的这一具体历史环境是有密切关系的。

第二章 李商隐的生活经历(上)

自幼孤贫

李商隐出生在一个小官僚家庭。从祖父一代起，即因做官由原籍怀州河内迁居郑州。他自己说与皇室同族，属于姑臧房^①。不过属籍失编，并未得到宗正寺的正式承认。唐人一般喜欢矜夸自己的家世，但李商隐在追叙先世时，只说祖父做过邢州录事参军，曾祖做过安阳县尉，高祖做过美原县令，官位都很低，大约即使再上溯几代，也不会有象杜甫那样可以值得引为荣耀的先祖。实际上李商隐的家族非没有什么能够让他感到幸慰和自豪的地方，相反倒颇带有点悲剧色彩。他的曾祖母卢氏，一生就很不幸，丈夫只活了廿九岁，年轻时即开始守寡。她艰难蹒跚地培养儿子(商隐的祖父)“以经业得官”后，儿子又因病早世。在“家惟屡空”的情况下，卢氏“忍昼夜之哭，抚视孤孙”。但抚孤成立，家道仍未能振兴。直至其卒后数十年，她的后人连将灵柩由郑州迁柩仅二百里远的怀州都未能办到。所以仅从这位曾祖母的一生，就足以看出李商隐的先世是如何地艰难和不幸。

李商隐有三位姐姐，又有弟妹五人。其中有一位裴氏仲

^① 姑臧房是李唐皇族的一支。李商隐《请卢尚书撰叔父故处士志文状》、《请撰仲姐志文状》等文都自称属于姑臧房。

姐，十八岁出嫁，十九岁去世。她死于母家，亦归葬于母家。这在封建时代颇为反常。可能是由于所嫁非人而被迫回到母家的。李商隐为她所写的祭文，较之哀奠其它亲属更为沉痛，显出仲姐之死使他特别伤感。他在《别令狐拾遗书》中曾指责当时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生女子贮之幽房密寝，四邻不得识，兄弟以时见，欲其好，不顾性命，即一日嫁去，是宜择何如男子属之耶？……至其羔鹜在门，有不问贤不肖健病，而但论财货、恣求取为事。当其为女子时谁不恨，及为母妇则亦然。”李商隐对嫁女“不问贤不肖健病”的封建婚姻，批判得如此深刻，并且显出一种切肤之痛，很可能与亲身感受仲姐的婚姻悲剧有关。

据李商隐回忆，裴氏仲姐辞世时，自己“初解扶床，犹能记面”，约周岁左右。其时父亲李嗣在获嘉（今河南省获嘉县）任县令，于商隐仲姐葬后不久，即离获嘉去浙江任幕僚。“浙水东西，半纪漂泊”，一家人在浙江度了六年的岁月。到李商隐约九岁时，不幸的事又降临了，这一年李嗣竟然病故，孤儿寡母，只得挣扎着返回故乡。“躬奉板輿（母），以引丹旌。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既祔故丘（将父亲归葬），便同逋駭（逃荒者）。生人穷困，闻见所无。及衣裳外除（守丧期满，除去丧服），旨甘是急。乃占数东甸（迁居洛阳），佣书贩春。”（《祭裴氏姐文》）在封建社会，象他这样“家惟屡空”，素无积蓄的寒族衰门，丧父后的窘困情况，即使诗人不作详细述说，也完全可以想见。

幼年不幸，饱尝“生人穷困”的滋味，对李商隐的影响不外两个方面：①是父亲死后，家境陡然转入极度困顿，世态炎凉必然给他以强烈的感受，并使他较早地对下层生活的艰辛有

所体察。二是家道中落之后，人单势孤，而他又是长子，^②担负着撑持门户的重责，在当时那种社会条件下，势必迫使他“悬头苦学”，渴望早日成名做官，以“立门构”。以上两方面的影响，是相联系而又相矛盾的。前者使他同情社会下层，而对上层与某些不合理现象有所不满和憎恶，后者则刺激了他的功名欲望，同时使他不免要攀附有权势的人，企图插足社会上层。

李商隐虽然“年方就傅，家难旋臻”，但并未因此失学。相反，他幼年所得到的教育倒是很好的。所以能够如此，与他的一位堂叔分不开。这位堂叔曾上过太学，于父亲死后，筑室守墓，发誓终身不从禄仕。商隐的从表叔崔戎等，“以中外钦风”，在士人中间颇有点名气和影响，劝他参加科举考试，都未能生效。穆宗长庆年间，路过徐州，军阀王智兴想以官禄相笼络，他“长揖不拜，拂衣而归”。堂叔的后半生一直在家乡读书讲学。李商隐说：“某爰在童蒙，最承教诱”，又说：“商隐与仲弟羲叟、再从弟宣岳等，亲授经典，教为文章。生徒之中，叨称遗者。”可见所得教益很多，并颇受器重。据李商隐追忆，叔父“通五经，咸著别疏，遗略章句，总会指归。……注撰之暇，联为赋论歌诗……未尝一为今体诗。小学通石鼓篆与钟蔡八分，正楷散隶，咸造其妙。”（《请卢尚书撰故处士姑臧李某志文状》）这样一位带点儒学复古气味、具有多方面学识修养的堂叔，给李商隐的影响自然不会很小。在他的熏陶和指教下，李商隐显得幼年早熟，“能为古文，不喜偶对”。十六岁就写了《才论》、《圣论》（二文今佚）两篇出名的文章，以擅长古文开始与一些士大夫交游。

受知令狐

大和三年，由于堂叔去世，李商隐求学阶段基本上结束了。这年十一月，令狐楚任天平军(治郢州)节度使，聘李商隐入幕做巡官。这是李商隐与令狐楚一家关系的开始。他在《祭相国令狐公文》中回忆了跟随令狐于郢州的情况：“天平之年，大刀长戟，将军樽旁，一人衣白。”所谓“大刀长戟”，是因为当时临近郢州的横海镇的叛乱刚刚讨平，仍存在着战争的残余气氛。所谓“一人衣白”，是因为李商隐尚未登第，没有官品，只能穿白袍。一般说来，象他这种被聘，只不过是初入官府，得到一些俸禄而已，谈不上有更多的意义。但李商隐这次入幕，却无意中迈出了他后来不免要跟党争发生牵连的第一步。令狐楚的地位很显赫，在宪宗时期做过宰相，属于牛党。李商隐称他“四丈”，可能是其父亲李嗣的朋友。他将李商隐引进幕府，大约有为牛党罗致人才的用意。史书上说，令狐楚“奇其文”，以其少俊，深为礼遇，并特意让李商隐跟自己的儿子令狐绹等交游。所以李商隐在郢幕与令狐楚的关系，远非一般府主和幕僚之间可比。“方将尊隗，是许依刘。每水榭花朝，菊亭雪夜，篇什率征于继和，杯觞曲赐其尽欢。委曲款言，绸缪顾遇。”这种关系，甚至引起周围一些人的种种反映，既有羡慕和赞誉的，也有嫉妒和谮毁的，而令狐楚的态度，用李商隐《奠相国令狐公文》中的话来说，则是“人誉公怜，人谮公骂”。唐代官方文书通用今体(四六)，善于做骈文是仕进的顺利条件之一。令狐楚是当时老一辈的作今体章奏的能

手。《旧唐书》说他“才思俊丽。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令狐楚曾在太原任幕僚），能辨楚之所为，颇称之。”因而名声颇大，很快做了大官。李商隐原是由于叔父的影响，不做今体文。此时令狐楚亲自指点，教给做今体文的诀窍，李商隐博学而又肯于用功，很快就青出于蓝，以擅长今体文而名闻当世。他早年所写的《谢书》诗说：“自蒙半夜传衣后，不羨王祥得佩刀”。对令狐楚的培养指教表示无限感激，同时踌躇满志，觉得连晋代曾做到宰相的王祥也不值得特别羡慕。当时他思想还很单纯，对宦途的风险几乎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万万没有想到他所学的章奏技巧，后来并没有帮助他致身青云，相反，命运倒好象有意作弄他，终其一生，他只不过凭着章奏的本领，长期在幕府里从事文字之役而已。他后期曾写过带有总结自己生平意味的组诗《漫成五章》，其中说“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对属能”^①。拿这种表面上象评价自己今体诗文，而实质上是自慨身世的沉痛语和《谢书》诗相对照，就会感到他早年的想法未免可笑而又可哀。

大和六年二月，令狐楚调任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李商隐又随至太原，直到大和七年令狐楚内调吏部尚书为止。这以后，约有一年时间转依于他的从表叔崔戎门下。李商隐有一首《安平公诗》，叙述他与崔戎的交往。从诗中可以看出，因为亲戚关系，李商隐除受到崔戎赏识外，彼此间还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情谊。相处时较少拘束，气氛很亲切。“丈人博陵王名家^②，怜我总角称才华。华州留语晓至暮，高声喝吏

① 宗师：指文坛领袖。对属，指在诗文中撰成对句。

② 崔戎高祖崔玄暉，唐中宗时封博陵郡王。